



聖嚴譯著
大師之研究

王文聖 嚴 譯著

本文爲聖嚴法師在日本立正大學獲得文學博士之畢業論文，對於蕩益大師及明末佛教思想有深廣之探討，亟爲遂譯，以供國人研究之參考。

第一章 智旭大師的時代背景

知義錄·卷之二

亡！

譯者

「第一節 政治、社會的關係」
(一) 明王朝之衰落

在中國政治史上，由平民躍登帝位的，漢高祖劉邦之後，唯明太祖朱元璋（西元一三二八——一三九八）一人而已，明太祖少時，雖會住過寺院，體驗過僧伽生活，但秉政之後，對佛教却無甚貢獻，殊爲可惜！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，雖歷二百九十一年（一三六八——一六六一）之久，概畧的說：除推翻蒙族統治，光復山河外，對於爲國家政治、社會經濟、和人民生活，甚少改善。由朱元璋開國起至南明三王滅亡止，計傳十九代，其中除太祖之外，堪稱爲英主的，祇是第三代的成祖（一四〇三——一四五二）和第九代的孝宗（一四八八——一五〇五）而已！蓋兩帝當政，恰值比較承平時代！他如武宗（一五〇六——一五二一）即因過於信賴宦官劉瑾，朝綱大亂；繼之世宗（一五二二——一五六六）也過於信賴弄臣嚴嵩，竟二十餘年，不問朝政，任由嚴嵩恣意妄爲。神宗（一五七三——一六一九）時，也同樣的十餘年不顧朝政；熹宗（一六二一——一六二七），則寵用魏忠賢及客氏，遂使朝政日壞，國勢日衰，由於這幾位庸主昏王，累世積弊，垂至明末，國弱民貧，內亂外侮，國勢板蕩，終不免於覆

明朝最强盛時期，應數成祖的永樂年間（一四〇三——一四五二），安南與朝鮮（韓國）都上表稱臣。四夷賓服，國力強盛，尤其是派太監鄭和遠征南洋後，當時稱臣進貢者，達三十餘國。武宗時，安化王、寧王相繼作亂；世宗時，倭寇進犯江浙閩沿海，同時北方的諸達阿羅多，屢次侵入大同、哈密、山西、寧夏、北京等地；尤其神宗萬曆十二年（一五八三），北方「女真部」的興起，這段時期，可以說是明朝建國後最動亂的時代。另一面，也是西洋文化，開始逐漸侵入的時期。明末的政府官吏，可以說是文官「無能」；武將「無節」的荒政！因明代的文官錄用，重視科舉制度，以四書、五經作試題，以「八股」刻板形式來作文，顧炎武（一六一三——一六八二）先生的『日知錄』卷十六「擬題」批評說：

「愚以爲『八股之害』等於焚書，而敗壞人材，有甚於咸陽之郊」。（台灣世界書局印行『日知錄集釋』三八六——三八七頁）

在『日知錄』卷十七「生員額數」中說：

「故敗壞天下之人才，而至於士不成士，官不成官。兵不成兵，將不成將。夫然後寇賊奸宄，得而乘之！敵國外侮，得而勝之！」（『日知錄集釋』三九六）

說明由「八股文」考試制度所錄用的官吏，皆是學殖空疎，缺乏才能之流，致使政治腐敗、武備式微、文教停滯，及社會經

濟的衰落，乃屬必然的結果！

又顧氏在『日知錄』卷十六「經義論策」，對神宗萬曆年間

的官吏無能之甚，沉痛論說：

「科名所得，十人之中，其八九皆爲白徒，而一舉於鄉，即以營求關說，爲治生之計。在州里，則無人非勢豪。適四方，則無地非遊客。欲求天下安寧，斯民淳厚，如却行而求及前人。」（『日知錄』三八三——八四）

由科舉考試制度所錄用的公務員，只是依八股文的形式，作模擬填寫而已，故彼等缺乏實學的修養，遂使吏治日益腐敗，同時由於經濟衰退，武備疏畧，致有流寇蠭起，疲於征剿，清兵乘隙入侵，明將相繼投降，如當時擁有重兵之孔有德、耿仲明、洪承疇、吳三桂等先後降清。

人禍而外，復天災頻仍，特別是近畿諸省，災情更爲嚴重，如『明史』第壹百八十卷「汪奎傳」（開明書店版七五〇七頁）所載：

「陝西、山西、河南，頻年水旱，死徙大半。山陝之民，僅存無幾……（中畧）……山陝河洛饑民，多流隕裏，至骨肉相噉。」

又『明史』同卷「李俊傳」（同右）：

「陝西、河南、山西，赤地千里，屍骸枕籍，流亡日多，萑苻可慮。」

當時陝西、山西、河南等省，餓殍遍野，盜賊蠭起，逐漸嘯聚，成爲流寇。在這些流寇集團中，以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張獻忠等股，脅裹最衆，流竄最廣，馬賊高迎祥，在思宗崇禎二年（一六二九）至九年（一六三六）的七年間，被竄擾的地區，遍及陝西、河南、湖北、安徽等四省。李自成於崇禎四年（一六三一），與孔有德共事起兵，崇禎八年，張獻忠也到處竄亂。十數年間，先後竄擾安徽、四川、陝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廣西等地，包圍北京，逼使崇禎帝，自殺於梅山（一六四四）。明朝統治遂瀕崩潰。

二、智旭大師所見「明末」社會動亂情形

爲研究智旭大師，必須先檢討其生滅年代。大師生於明末萬曆二十七年（一五九九），寂於永明王永曆九年，（一六五五），清順治一二年。崇禎帝自殺於梅山後，明裔諸王，仍相繼起而頡抗者，達於十五年之久，若南京之福王（一六四四——一六四五）、福州唐王（一六四五——一六四六）、肇慶（廣東省）之桂王——永明王（一六四六——一六六二）。然南京福王與福州唐王，不過僅兩年的短命政府，唯廣東的永明王，維持至永曆十三年（一六五九）始亡。

由此可知，智旭大師的一生，適值明末亂世，大師對於當時的政治社會，究竟有如何的關係？曾從其著作中詳加查考，惜未得充分的資料。唯載於法語、書簡中，揭出有六十餘名，但彼等的官職稱號一概省畧，故不容易作個別的檢討！現唯能從『靈峯宗論』的編集者成時法師，作該論集的「序說」中所說（『靈峯宗論』卷首——七頁）：

「法語、書柬中，諸名公鉅卿，遵大師原稿，但書姓名，概不書尊稱！以末法，道則僧體日卑，爭務乞靈人爵；俗則我不相重！終難覲破浮雲。」

智旭大師，對當時的政界中的顯要，還有往來。但據他四十五歲時，所著『闢邪集』却說：「不與名公大人交，亦不思致身以事君」的自白，又可證明不願與政界人物結交，又如「復卓左車」的書簡說（『宗論』五之一——『全集』卷十七——七頁）：

「承謬舉於葉宗伯，謂宗說俱通，解行雙到，實增慚愧！……中畧……山野病夫，不敢浪通其名，葉公處，以原柬繳。」

上述，也許就是旭大師，自從明朝滅亡後，隱逸山中，且不願與清朝政界交往的實證。因清代的編制，對於禮部尚書，俗稱爲「大宗伯」，侍郎爲「宗伯」；或「小宗伯」。所稱葉宗伯，也許是滿清政府的侍郎公卿，故對於邀請不單斷然的固辭，且不願出具真名，旭大師如此的清高，誠是值得現代行者們的效法。關於旭大師的家世，其祖先，原在河南省汴梁（開封），至

其始祖時，移住於江蘇省吳縣木瀆鎮，父鍾岐仲公，母金大蓮夫人。據大師的自傳（『八不道人傳』）說：鍾氏一家，乃屬慈善文雅的家庭，與仕宦無關係。但『見聞錄』却說其母舅的金赤城，乃是政府官僚，（『正續藏經』精·一四九—一四〇C）：

「余母舅金赤城，守贛州……中畧……未幾，陞衰東兵道。」

旭大師，雖與明末清初的政界人物有關，但對其宗教生涯及活動上，却不受政界人物的援助，這還可看出不失明末遺民的旭大師的清高亮節！另一面，身爲宗教家的旭大師，對於社會的苦難，民衆的悽慘狀態，極表悲愍！這都表現於願文中，在『鐵佛寺禮懺文』說（旭大師四四歲，西紀一六四二年，『宗論』一一四一）：

「目擊時艱，倍增愴惄！斗米幾及千錢，已歎民生之苦！病死日以千計，尤驚業報之深！」

又「禮千佛告文」（大師四七歲，一六四五，『宗論』一六六）：

「疾疫饑荒湧至，已至寒心！干戈兵革頻興，尤堪喪膽！父母妻孥莫保，骨肉身首分離！百骸潰散，誰思一性常靈！邁鬼聚號，肯信三緣自召！悠悠長夜，淚與血而俱枯！漠漠荒郊，魂與魄而奚泊！」

更在『占察行法願文』（大師四八歲，一六四六，『宗論』一四一〇）：

「又祈江南、江北，乃至震旦域內，近日遭兵難者，種種債負消除！一一怨嫌解釋，脫幽冥之劇苦，胎蓮萼以超昇！」當時所蒙難的地域，不只華北，竟擴展至華中、華南，及於西南各地，可以說是遍及於整個中國領土。當時這種的悲慘狀態，由佛教宗教家的立場看，即屬衆生的業報所招，故旭大師，專爲被害者們的菩提種子著想，才幾次舉行禮懺，將其功德回向給

苦難中的衆生，能獲脫離苦境；既亡者速生於佛國淨土！然至末法時代，尤其戰亂中，能幸免於災難者甚少！因旭大師的先輩長老中；如徧融真圓（一五〇五——一五八四）、達觀真可（一五四三——一六〇三）、憨山德清（一五四六——一六二二）等三

位高僧，都受過逼害，這在旭大師的自著文獻中，會有述及（參照：『示靖開』法語，『宗論』二十二——一五）（待續）

（上接第11頁 佛經俗講與小說）

正文部份，詞話以白文敘事，以詞調歌詠，體例正如省去唱經的變文。「十段錦詞話」中即有一詞，把這體例說得很明白：

一段詞，一段話，聯珠間玉。一篇詩，一篇鑑，帶武間文。元明人既有倣宋人平話之作，稱爲詞話，則明中葉以後出現的小說，自是改革詞話的體例而成。這些小說，着重於說白敘事，所以詞的部份便可以省略了，至於其中還插入一些韻語，以形容人物，則只是講唱的痕跡，在小說中的地位並不重要。然而這些重白輕韻的小說出現，却是我國文學史上的另一高潮。

千餘年間，由俗講的變文演爲小說，變化可謂繁雜，是則佛經的輸入，影響我國文學的深廣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（上接第16頁 智者大師「聖之時者也」）

或問：佛教自來對教理問題，屢有爭辯，以天台宗而言，宋時即有山家、山外之爭，吾人今日也可效法前人從事批判嗎？個人以爲：此應視自身之德學而定；若有往聖前賢之德（不謾罵、不寫恐嚇信）之學（教理圓融）則可，無，則是謗（法）也。今有人焉，對天台學之「敵對相即」「十如是」……尚不了了，且自云學佛以來，未聞性惡之說，則去批判之程度尙遠。何況，天台宗乃教下三家之學，世出世法淵博如梁任公，尙感到旨深義奧，即教外人士亦認爲，天台宗是「調和一切，包含一切」（雷伯倫教授撰「中國文化的兩週」），所以要想批判天台宗，談何容易！

聖人有言：「士有諍友，則身不離於令名。」關於天台性具問題，筆者已盡同道忠告之諱，「朋友數斯疏矣」，今後對此問題，不願再談，並對其人之文，亦不寓目。爰舉法華一偈，以結束本文：

「惡鬼入其心，罵詈毀辱我，我等敬信佛，當着忍辱鎧。」